

甘肃省主观幸福感调查分析——基于CGSS2017数据

杨建军

广州工商学院

摘要：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河西走廊的所在地，其主观幸福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心（NSRC）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为基础，使用SPSS24.0软件，对甘肃省居民的主观幸福感（SWB）的整体情况、收入水平、性别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甘肃省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数为64.62，高于理论平均值，甘肃省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年龄段没有相关性，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线性相关性。本文同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与高校《管理学》课程思政结合的可能性，认为两者之间可以良好的互通互益。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CGSS2017；甘肃省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10.06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伴随产生了社会压力和贫富差距问题，大量人群普遍感觉到精神压力甚至有愤世嫉俗的抱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切实提高普通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们国家的迫切需要。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同时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研究甘肃省的主观幸福感问题，是近年来以主观幸福感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的新应用。在当前由于新冠疫情和国际外部环境有压力的情况下，考察各种人口学变量、收入等因素对甘肃省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各种政策干预对主管幸福感的影响的调节作用，将有助于更好促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共同富裕建设的健康发展，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士在跨学科构建对生活质量认知的量化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对主观幸福感（SWB）测量展开了界定和测量，将主观幸福感的学术范围定义为人们对本人所处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的整体评价的自我认知，学者们认为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维度主要有两个维度，即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满意度。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纽加顿（B. Neugarten）在整体生活满意度领域制作了“生活满意感指数量表（Life Satisfaction Index）”，采用多个单项目由被调查者填写自我陈述量表的方法汇总得出总体满意感分数，该量表包括身体，心理，社会等维度。1980年以后，对生活满意感的研究趋势改为构建多个项目总体满意度量表，例如1985年Diener等发表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随着积极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发展下，主观幸福感开始以没有心理问题的常人的

心理适应、心理调整过程和追求人生幸福的动机进行研究，其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状况取决于主观积极因素和主观消极因素的对比和平衡，若人们主观积极因素认知多于主观消极因素便可推定被调查者是幸福的；否则反之，其代表量表有学者Bradburn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ABS），Kozma和Stones编制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均可以从主观积极因素和主观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全面地把握被测者的幸福感状况。1980年以来，我国著名学者林南等以上海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对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测量了家庭生活等8个项目的主观满意满意度。我国学者段建华等以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为基础，以我国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进行了测量。学者Kee-Lee Chou从积极情感状态、消极情感状态和抑郁症倾向三个项目，对香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测量。学者Lu Luo编制了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并对台湾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测量。2004年，我国著名主观幸福感学者邢占军编制了适用于大规模社会调查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C），该量表包含54个项目，并有包括20个项目的简表SWBS-CC20，经过实证后发现此表具有良好的同质效度，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连续多年被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问卷采用，在调查问卷内编号为D40。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前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认为，中国大陆居民的幸福感是先高后

低，然后再次升高的U型变化的过程。1990至2000年呈下降趋势，2000年左右跌至最低点，随后开始回升。邢占军等学者认为我国居民幸福感于2000年以后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居民幸福感受地区和性别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高于中西部地区，幸福感存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幸福感得分也缓慢提升的趋势。李磊等学者认为中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是显著高于男性的。

因而，本文提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甘肃省的主观幸福感与年龄段有显著相关性。

研究假设2：甘肃省主观幸福感是有显著性别差异的。

研究假设3：甘肃省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有显著相关性。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面板数据，对甘肃省主观幸福感的现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本文主要采用邢占军教授的SWB-CC20量表，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由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维度构成。量表有20题，每2题为1个子量表。每题均采用6点计分，“很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计1至6分。第4、5、6、9、10、11、13、15、17、18、20题为反向计分，“很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计6至1分。邢占军曾报告该量表的信度为0.848，效度为0.972，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中每个项目采用6级评分制，按照邢占军的观点，以算数平均数3.5分作为参照值，分值越高代表越幸福，4.5分以上为较高水平，2.5分以下为较低水平。经过百分制调整后，总体幸福感指数的理论算数平均数为58.4分。

2. 解释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demographic variables）

本文使用基于CGSS问卷题干中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籍贯、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婚姻、文化水平、收入等。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统计分析

本文筛选了200位在甘肃省采访者的具体个案对性别，民族，最高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身体健康状况，户口，手机，单位或公司类型，共同居住人数，房产数量，婚姻状况，身心状况，生活状况满意度，幸福感得分展开分析，实证资料整理如下。男性受访者95人，女性受访者105人；汉族199人，回族1人。群众171人，共青团员18人，共产党员11人。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及以下者125人，比较健康及以上者75人。农业户口177人，非农及居民户口23人。192人户口地与居住地一致，8人户口地与居住地分离。179人有单独使用的手机。157位受访者的单位或公司类型缺失。44%的受访者共同居住人数在2人（包含2人）以下。169位受访者拥有1处房产，24位受访者有2处房产。13.5%的受访者未婚。身心健康回答率仅32.5%，回答者中认为身心健康一般和差的占比55.4%。生活状况满意度回答率仅31.5%，回答者中认为满意及非常满意的占比84.1%。134位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幸福感得分为0，占比68.7%。

此外对年龄（AGE）和D40量表主观幸福感（SWB）进行基本描述量分析，计算其集中趋势，离散趋势和分布形态的相应指标值。甘肃省200位受访者有效回答人数63人，主观幸福感平均数为64.62，众数65，标准差9.77，最低值33.33，最高值99.17，全距65.83，偏度0.026，峰度3.486。从平均值看，高于量表涉及的理论均值为58.4分。

（二）推断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受访者的年龄分段及主观幸福感分段统计表，以埃里克森发展心理学对年龄分为3组，以邢占军SWB-CC20的理论均值，对主观幸福感分为2组，对甘肃省受访者的年龄（行变量）与主观幸福感（列变量）进行列联分析，由于主观幸福感有效应答值较小，期望频率很多少于5，在埃里克森发展心理学基础上，将年龄分组分为成年早期和成年晚期2组，主观幸福感分为高低2组，采取2*2列联分析，皮尔逊卡方值检测结果为甘肃省的年龄（行变量）与主观幸福感（列变量）之间相互独立，无法说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有相关性。

其次,利用参数检验的两独立T检验,对甘肃省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与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检验。根据参数检测结果,发现甘肃省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与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

第三,利用相关性分析,对甘肃省受访者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经过分析发现,甘肃省受访者的全年总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样本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92,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弱,而且双尾显著性水平P值为0.496,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全年总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两总体是零线性相关。

五、研究总结与启示

本文基于CGSS2017数据,实证检验了甘肃省主观幸福感与性别,收入,年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甘肃省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年龄段没有线性相关性,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线性相关性。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一)甘肃省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如果考虑到埃里克森发展心理学将18岁后的成年期分为成年早期,成年中期和成年后期的做法,进行列联分析时,发现有大量单元格期望频数小于5,不适宜采用卡方检验。因此很有必要在甘肃省进一步增加调查者的人数,例如扩大到1000人左右。

(二)政府应当建立相关进一步调查,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女性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为何没有出现在甘肃省,进行调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据女性权益保护组织的观察,西部地区女性的受教育年限,传统思想禁锢,经济地位等均较东部地区低,是否这些变量影响了女性主观幸福感没有类似东部地区一样,普遍高于男性,值得进一步调查和对比。

(三)根据学者李磊和邢占军的研究,主观幸福感与总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但CGSS2017数据中的甘肃省居民的数据分析结果,没有说明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调查是何种中介变量或者调解变量影响了这种本应该出现的正相关关系。

(四)人口统计学信息中,发现甘肃省的200位受访者的户口类型中,农业户口占比为88.5%,汉族占比为99.5%,与第7次人口普查及甘肃省城镇化规划的此省数据的结构相差很大,说明抽样很可能代表性不足,也说明CGSS2017分析时,似乎应该采用若干省数据进行联合分析,例如西北5省区的数据,而非仅仅使用某个省的数据。

(五)反映主观幸福感的D40量表拒答率超过一般问题,仅为31.5%,近七成的受访者拒答问题,本身非常值得研究,鉴于此量表已经有近20年历史,建议采用深度访谈,了解原因并对D40问卷开展改进的尝试。

(六)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部等10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主观幸福感与二十大报告中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并持续观测,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供学术支持。

参考文献

- [1] 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卢艳华.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3(07):10-23.
- [2] 邢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2(03):336-338+342.
- [3] 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
- [4] 李磊,刘鹏程,孙嫚.男性与女性,谁更幸福[J].统计研究,2017,34(07):82-93.
- [5] 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25(01):196-219+245-246.

作者简介

1.杨建军,1978年4月生,男,河南夏邑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研项目:基于SPSS统计软件分析课程的大数据师资培训(202002058032)。广州工商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应用型本科大学商科类学生的统计学课程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ZL20201229)。广州工商学院校级社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制造型服务业与绿色金融结合研究(KA202114)。广州工商学院《管理学》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ZL20201205)。